



引用格式:欧阳明,杨晓琴,桥美幸,等.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3):49-59.

中图分类号:G206.3;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3.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3-0049-11

#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 Research on the image of peasants in the current textbook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欧阳明,杨晓琴,桥美幸,赵星星

OUYANG Ming, YANG Xiaojin, KIEU Myhanh, ZHAO Xingxing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一国中小学的教科书是培育国民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思想意识的特殊的出版物,是国民教育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亦不例外。通过研究发现,人教版第10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出现农民形象的课文占课文总数的一成多,占比比较大,具有以下特点:主要以群体形式出现,多为男性;在时间上以现代农民形象为主,在国别上以中国为主,存在少量外国农民形象且主要为俄罗斯农民;以积极的农民形象为主,负面形象为辅;淡化农民的阶级背景,着重构建社会地位平等的农民形象;主要通过“图文并茂”、白话文、叙述的形式描述农民形象。可见,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是以知识为中心的信息客体与主体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结合体,体现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内容上,教科书在构建农民形象时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观为导向的;在形式上,出版主体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是柔性的,其对培养的学生呈现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

**关键词:**  
中小学教科书;  
农民形象;  
出版;  
培养理论;  
柔性教育

[收稿日期]2020-04-13

[作者简介]欧阳明(1957—),男,湖南省常宁市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编辑学;杨晓琴(1995—),女,四川省巴中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桥美幸(1991—),女,越南河内市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新闻学;赵星星(1989—),女,湖北省荆门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图书出版学。

农民是创造辉煌灿烂、绵延持久的中华文化的主体与社会基础,其状况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的社会力量。中小学教科书,是培育国民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思想意识的特殊的出版物,是各国着力打造的意识形态基础平台和传播知识、文化的基本工具,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生学习通过教科书,不仅学习知识,完成学业,而且于有形无形间受到其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熏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教科书中的出场,是以知识为中心的信息客体与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结合体,体现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中小学教科书在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性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研究中小学教科书中农民形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通过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Journal Storage”“Oxford Journals”“中国国家图书馆”“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等国内外大型图书馆和数据库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集中讨论电视、报刊、新媒体等新闻媒介中的农民形象,未发现有人对图书尤其是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进行研究。研究中小学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特征及其意义,不但有助于丰富、深化“三农”和教育领域的研究,而且有益于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拓展、深化传播学、出版学的学术研究。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研究资料,以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对人教版第10套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加以分析,以展现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基本样态,勾勒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基本框架;分析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表层与本质意义,探讨其形象呈现的基本逻辑和规律,以及背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其对我国教科书出版与编辑工作的启示,在量化研究的基点上拓展、深化新闻传播学与出版学

的学术研究。

## 一、研究概况

### 1. 核心概念界定

#### (1) 农民

农民,泛指务农的人<sup>[1]</sup>,具体指直接从事耕种、养殖等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有的农民掌握一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但也有不拥有土地,仅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农民<sup>[2]</sup>。本文所指的“农民”,在职业性质、生存状态、行为规范、思想观念等方面均有别于城市居民,主要包括以下4类人:一是主要从事农业劳动,或是其生活资料、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二是世代生活于农村,从事非农业职业并以此为本地乡亲服务的劳动者,如船夫;三是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村妇女,她们是家庭劳动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是从乡下进城的务工者,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其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在性质上仍属于农民群体。

#### (2) 教科书

教科书,又名课本、教材<sup>[3]</sup>,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教学用书,是为一定年级的学生掌握某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而编写的图书<sup>[4]</sup>。

#### (3) 媒介形象

媒介形象是被传播者在媒介中的呈现状态,是大众传媒再现事物认知的总和。本文所讨论的媒介形象,是一种承载特定意义的媒介再现,着重于农民在教科书中的再现样态与特征。

### 2. 研究假设

假设一: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较多;假设二: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为男性;假设三:教科书中的农民所处时代以我国封建社会为主;假设四:教科书的农民形象以积极形象为主;假设五:在表达方式运用上,语文、历史教科书以叙述为主,政治教科书以议论为主;假设六:教科

书中的农民形象在表达上比较生硬。

### 3. 研究设计

#### (1) 样本选择

在学段的选择方面,本研究选取的教科书涵盖我国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3个阶段。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本文选取的3个学段,统称为普通中小学教育阶段,属于基础教育阶段范畴。

在教科书科目的选择方面,本文选取的教科书包含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3科必修教材(见表1),共54册。

中小学阶段语文、政治、历史科目所传播的知识和观点,以流行于主流社会的认识和价值标准为主,意识形态属性鲜明。这是本研究样本的选取范围。另外,我国小学阶段未开设历史课程,因此样本不涉及小学历史教科书。高中教科书分为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两类,分别与必修课和选修课相对应。选修教材是必修教材的补充,供教师选用,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

在教科书版本的选择方面,本研究所选取的教科书分义务制教育阶段所用的教科书与高中教育阶段所用的教科书两大类。其中,小学和初中教科书,选用的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根据义务教育课程设置的实验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高中教科书,选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与新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相配套的、新的普通高中课程计划和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所编写的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上述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阶段的新课标教科书,统称为第10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其所呈现的农民形象,是认识、理解、评析我国教科书出版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抽样与分析单元方面,本研究以“单篇课文”为一个抽样单元。教科书中的其他板块(如“单元导语”“课后习题”“课后探究”等)不纳入抽样范围。语文教科书中的“寓言二则”“古诗二(三、四等)首”“短文两篇”“日记二(三、四等)则”等课文形式,均按一篇课文进行统计。当一篇课文出现符合本文概念标准的农民形象时,该课文即成为本文的考察对象。若一篇课文中出现多个符合要求的农民形象时,则相应记为多个农民形象。

#### (2) 类目建构

美国社会学家贝雷尔森认为,内容分析的类目一般可分为“如何说”与“说什么”:前者包含对象、方向、特性、主人公、权威、起源等内容;后者包括沟通类型、旁白形式、感情强度等内容<sup>[5]</sup>。本研究在贝雷尔森分类的基础上将类目进一步分为形式类目和内容类目。

形式是文章内容由文字等符号表现的外化。本文根据第10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实际,将形式类目分为符号与表达方式两大部分。

本文的符号指刻画农民形象所使用的信号体系,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教科书的语言符号主要表现为书面语言文字,非语言符号主要表现为图片。因此,本文将教科书课文呈现农民形象的符号分为“文字”“图片”“图文并用”3种。“文字”指文字表现农民形象,“图片”指用图片展现农民形象,“图文并用”指采用图片和文字两种形式共同呈现农民形象。同时,为了进一步考察语文教科书中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例,本文又将“文字”再分为“文言文”

表1 本研究所选取的教材一览表

学段	语文	政治	历史
小学	语文	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	无
初中	语文	思想品德	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高中	语文(必修)	思想政治(必修)	历史(必修)

与“白话文”。文言文,又名古代汉语,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和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sup>[6]</sup>。白话文,即现代汉语,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汉民族共同语<sup>[7]</sup>,采取现代汉语写作的文章统称为白话文。

本文涉及的表达方式有5种:叙述,即陈述事实过程;描写,即描绘人物或事物状貌;说明,即解说事实原委、原理;议论,即表达意见,阐明观点;抒情,即抒发感情。若一篇课文出现多种表达方式,只记录所占篇幅最多、最为重要的表达方式。

文章的内容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材料,二是思想。本文着重分析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呈现特征及其背后意义,并由此将内容分为题材与思想两类。

题材是教科书在呈现农民形象时所表现的事实范围与领域,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性别,具体为男、女、综合、未知4类;二是年龄,具体分为老年(60岁及以上)、中年(45—59岁)、青年(18—44岁)、综合(包含两种及两种以上年龄段)、未知(未交代年龄或无法辨识)5类;三是时间,具体分为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1949年)、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未知(没有交代农民所处的年代)4个时期;四是国别,具体可分为中国、外国、未知3类。

思想指课文所蕴含的作者对农民形象的价值判断,包括性格特征和身份地位两个方面。性格特征分为:积极,具体表现为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忍勇敢等特征;消极,具体表现为愚昧、自私、胆小、麻木等特征;中性,指无褒贬倾向。中性的样本有两种情况:一是样本内容为一般事实,未对农民的精神品质进行评价;二是样本的积极与消极特征并存,作者未体现出明显的褒贬倾向。

社会地位是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处的

位置,即权利和义务的综合<sup>[8]</sup>。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本文所说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分为3种情形:当农民受重视、受尊重、受到平等待遇的时候,用“平等”表示;当农民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用“不平等”表示;当样本未涉及或无法辨识农民形象的社会地位时,用“未涉及”表示。

#### 4. 信度检验

本研究由两位编码员对中小学教材中的农民形象的样本进行编码,为确保定量分析的客观性,提升准确率,随机抽取5个类目(表达方式、时间、年龄、性格特征和社会地位)对编码员进行信度检验,根据霍斯提公式得出信度值分别为0.95、0.92、0.92、0.85、0.90,信度较高。

## 二、研究发现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具有以下特征。

### 1. 中小学教科书中体现农民形象的课文占课文总数的一成多

纳入研究对象的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三科教科书共计54册,共有1050篇课文,其中表现农民形象的课文138篇,分别为语文60篇,政治46篇,历史32篇,各科目中共出现224个农民形象,其在各学段各科目的分布情况见表2。

总体来看,体现农民形象的篇数占总篇数的13.14%,这说明农民形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占有较大比例,与前面的假设是一致的。同时,

表2 农民形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的

学段	分布情况			篇
	语文	政治	历史	
小学	39	48	—	87
初中	27	18	32	77
高中	9	24	27	60
总计	75	90	59	224

四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第五单元以“乡下人家”为单元主题,专门描写农村实际和农民生活,这说明教科书对农民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以上事实说明:第10套人教版小学语文、政治、历史3科教科书对农民形象的表现,既范围较广又讲求重点,体现出议题设置上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

## 2. 农民主要以群体形式出现,个体农民多为男性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为“综合”的农民形象有119个,占比53.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农民形象性别特征不明显。在性别明确的农民形象中,男性农民有72个,女性农民有33个,男、女比例为2.2:1,女性明显少于男性。这说明,中小学教科书首先偏向于构建无性别差异的农民群体形象,其次才是在重视无性别差异的前提下构建男性农民形象,这说明教科书出版者存在着一定的性别盲区,与本文假设存在一定的出入。

从年龄上看,除年龄“未知”的33个(占比14.7%)农民形象外,在“已知”年龄的191个农民形象中,年龄为“综合”的农民形象有117个(占比52.2%),且多以群体形式呈现。在具有明确年龄的个体农民的形象中,10个(占比4.5%)是中年农民,青年和老年农民分别为33个(占比14.7%)、31个(占比13.8%)。这反映了教科书出版者高度关注农民操劳的一生,这对建构农民劳动者的媒介形象是有益的。

概而言之,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以群体形象为主,相对淡化农民的性别、年龄差异,以男性角色为主来构建农民劳动者身份,以其劳苦活动为核心来展现农民媒介形象。

## 3. 农民形象以现代农民为主

首先,从总量来看,除5个(占比2.23%)无法判断所处时代的农民形象外,其余农民形

象以现代农民居多,随后依次为“古代”“近代”,样本量分别为125个(占比55.80%)、60个(占比26.79%)、34个(占比15.18%),与前文假设有较大出入。其次,从科目来看,三科有别。其中,语文教科书中农民形象所处的时代较为均衡,偏向于展示现代、古代的农民,样本量从多到少依次为“现代”(30个)、“古代”(24个)、“近代”(16个),政治判断偏弱。政治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所处的时代以“现代”为主,为81个(占比90%)。历史教科书偏向于展现古代的农民形象,样本量从多到少依次为“古代”(29个)、“近代”(16个)、“现代”(14个),即从古至今的农民形象依次减少。三科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时间分布与课程特点相关。中小学政治课文的原理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教学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国情民情的教育,时代要求其课文内容理应多选用现代题材。历史教科书以历史长河为时间范围,漫长的古代史与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古代”的农民形象占比较高。语文教科书的“古代”农民形象居第二位,虽与居第一位的“现代”农民形象差别不大,但可以反映教科书出版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 4. 以中国农民形象为主,存在少量外国农民形象且主要为俄罗斯农民

从国别来看,中小学教科书以呈现中国农民形象为主。在224个农民媒介形象中,中国农民为200个(占比89.29%),24个为外国农民形象(占比10.71%)。在外国农民形象中,俄罗斯农民形象有13个,占外国农民形象总量的54.17%,其中语文教科书中3个,历史教科书中10个。这反映了俄罗斯文史对我国的影响。

## 5. 以宣传积极的农民形象为主,以宣传负面的农民形象为辅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偏向于展现正面的、积

极的农民形象。首先,正面形象占据农民形象的主流。其中,正面农民形象为121个(占比54.0%),中性的农民形象居次,为85个(占比37.9%),与前文假设一致。其次,正面农民形象的题材场域集中于生产领域。数千年来,炎黄子孙扎根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主要以耕种而不是渔猎、游牧求生存、谋发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成为九州农民最朴素的思想。中小学教科书表现农民形象的主要场景是农夫们在农田上挥汗如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从未止息。再次,农民形象的积极性体现在其精神价值上。教科书着重于展现农民的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忍勇敢特征,样本数量分别为46个、20个、14个,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是教科书出版者的主要着眼点和落脚点。

当然,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农民形象,共计18个(占比8.1%)。其中,14个来自语文教科书,3个来自政治教科书,1个来自历史教科书。教科书中形象负面的农民多生活在封建社会,其负面性集中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愚昧、自私、胆小、麻木是这一群体的主要消极表现。造成农民群体消极的深层次原因有三点:一是导致农民病态心理的社会因素。广大贫苦农民的消极性,源自统治阶级的精神愚弄,出版者将重心转向批判封建主义制度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与不公平。二是导致农民精神落后的文化因素。例如,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既勤劳、善良、顽强,又饱受包括夫权在内的封建纲常束缚,其愚昧源自无缘接受教育,试图从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解脱,是封建社会的受辱者、受害者。三是导致农民精神落后的生产力因素。例如,余秋雨的散文《信客》表现出农村信使的生活常态及其艰辛,与信使的诚实守信品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的目光短浅、斤

斤计较与冷漠。相比于信使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广大农民则被深深地束缚在土地上,生活视野的狭窄和生活的重负使其难以实现精神上的超越,无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小学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册指出,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在“非典”期间迷信而借助鬼神驱除病魔,表现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精神弱点,显示出在广大农村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

总体来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着重构建正面农民形象,赞美其精神品质和历史贡献,同时又兼顾指出农民的时代局限性,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展示较为立体。

## 6. 淡化人物的阶级背景,着重构建社会地位平等的农民形象

首先,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161个农民形象未涉及农民的社会地位,占比71.9%。这些教科书课文在刻画农民形象时常淡化其阶级背景。其次,涉及社会地位的63个农民形象中,有26个(占比41.3%)涉及社会不平等,37个(占比58.7%)体现了平等的社会追求。总体来看,社会平等语境下的农民形象远多于不平等社会环境中的农民形象。再次,不同时代的农民形象,其社会地位也不一样。处于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其社会地位为“平等”“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5个、17个;处于1840—1949年的近代农民中,其社会地位为“平等”“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9个、7个;1949年以后的现代农民,其社会地位“平等”与“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23个、2个。可见,农民媒介形象在封建社会中的社会不平等遭遇是突出的,在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不平等命运略多于社会平等命运,这反映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性质的判断,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新旧两大阶段历史存在与使命的认知。

## 7. 主要通过“图文并用”的形式描述农民形象

首先,“图文并用”的表现形式占据数量优势。在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224个农民形象中,有90个(占比40.2%)是以“图文并用”的形式呈现的,有56个(占比25.0%)是用图片形式呈现的,有78个(占比34.8%)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可见,“图文并用”是第10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展现农民形象的主要形式。其次,“图文并用”发挥了符号体系的优势。教科书在表现农民勤劳、智慧时,既有文字又有图画。语文学科讲求审美观照。例如,小学四年级下册课文中南宋诗人翁卷的《乡村四月》有文有图:“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展示了我国传统乡村的经典劳作场景,配图又将诗歌中所寄寓的深深体恤具象化为画面。小学政治教科书常使用“图文并用”形式,将田间耕作、种棉花、割水稻,山坡植树、牧羊,河湖捕鱼,以及粮农、菜农、果农、棉农、渔民、牧民等各类农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图文并茂地呈现出来,场面与细节相交织,场景跳跃而流动,从而使各时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得以形象而生动地展现出来。教科书在形式上的生动性,与本文的假设有出入。

## 8. 主要通过白话文形式呈现农民形象

在文字使用上,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各科表现不一。首先,政治、历史教科书课文多采取白话文形式。因为语言教学不是两课的教学任务,采取国家规定的通用语言合情合理。其次,语文教科书文白并用,以白话文为主。在刻画农民形象的60篇课文中,白话文为47篇(占比78.3%),文言文有13篇(占比21.7%)。可见,语文教科书在刻画农民形象时,主要采用白话文形式,采用白话文形式的是采用文言文形式的3倍。第10套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时代立场鲜明,文字较为通俗易懂,这说明教科书出版方深知文言文艰涩难懂,广大中小学生学习不易接受,在语言选用上以

白话文为主。

## 9. 主要通过叙述方式表现农民形象

首先,语文、政治、历史三科在刻画农民形象时使用的表达方式总体上以叙述为主。其中,以叙述为主的课文共计73篇(占比52.9%),以描写、说明、议论、抒情为主的课文分别为22篇(占比15.9%)、13篇(占比9.4%)、21篇(占比15.2%)、9篇(占比6.5%)。其次,各个科目在表达方式选用上有差别。语文课文中主要采用叙述的占比51.7%、主要采用描写的占比31.7%,两者相加超过八成,而抒情占优的课文居然高达15%(9篇)。语文着重于美育,选取的课文以文学作品为主,自然离不开叙述,但作品的形象化本质决定作品也应多使用描写。而课文抒情成分较多与语文教科书收录一定数量的诗歌相关。相比之下,政治教科书用以建构农民媒介形象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叙述(占比41.3%)、议论(占比30.4%)与说明(占比26.1%),叙述的活跃程度出乎意料。政治课文一方面要准确表达基本政治原理,自然少不了议论与说明;另一方面,说理要适应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举例要有助于课文的通俗性、生动性,而举例势必要大量使用叙述的表达方式。可见,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以叙述为主的课文居首,这说明出版者对学生的接受偏好是高度重视的。历史教科书以叙述的表达方式为主(占比71.8%),这显然与该课程课文必须讲清楚历史事实密切相关。

## 三、讨论与启示

教科书是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版物,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不可能不寄寓一定的立场、思想。总体来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在内容上,折射了社会共识,即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在形式上,出版主体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是柔性的,呈现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教育学生的特点。

## 1. 内容上以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为导向

在选题上,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多强化农民的群体特征,但在自然因素上有特殊偏好,时间以现代为主,存在一定的性别倾向。

首先,教科书在题材选取上突出农民的群体性,年龄、性别方面的差异不突出。大众传媒对客观世界的表现,是关于客观世界范围、区域的抉择,不可能将大千世界的所有都纳入有限的版面内。而这种关于客观世界范围、区域的选择,用之于大众传媒,就成为媒体的议题设置。作为主流社会的重要精神活动工具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资源,教科书的议题设置受制于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以美国 G. 柏格纳为首的传播学者创建的培养理论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成员达成一种共识,即对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与行为才会有共同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sup>[9]205</sup>。教科书是实施并完成国民教育的主渠道,将主流社会认知框架先置于中小学生的头脑中势必会产生首因效应,影响、规范、左右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因此,人教版第 10 套中小学教科书在议题设置上赋予农民以重要地位,聚焦中小学生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关注点。这也是农民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重要贡献的必然反映,是党和政府历来高度关注的“三农”问题在教科书中的自然表现,更是对我们党基本政治路线的一种自觉的贯彻、执行。

其次,教科书在建构农民媒介形象时对自然因素存在一定的偏好。其一,在性别上,教科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展现偏向男性。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以男性为主,承受生活磨难与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也以男性为主。这既是生产力低下条件下

繁重的农业生产基本由具有体力优势的男性承担的客观反映,又折射出我国耕种传统所积淀、延续的男权社会的实际。其二,在时间上,教科书偏爱关注现代农民,这一方面与教科书编者所处的时代有关,编写、出版教科书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另一方面又与科目相关,政治教科书重视贯彻主流社会的政策与大政方针,讲求及时反映时代潮流,着重于教育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反映现实的内容较多。其三,在国籍选择上,教科书倾向于展示中国农民形象。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教育对象是中国的未成年人,目标受众决定了其选题要贴近国情,以中国农民为主。同时,教科书又存在少量的外国农民媒介形象,但多为邻国俄罗斯的农民。俄罗斯农民形象在我国教科书中占据较大比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帝俄\*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欧美,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有独特的村社传统。村社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俄罗斯农民有不同于西欧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保障,这成为集体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而表现农奴制下帝俄农民命运与苏俄农村巨变中的农民形象是帝俄、苏俄文学创作的一大优势。二是苏维埃的红色基因。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 13 个俄罗斯农民形象,大多生活在列宁时期。“五四”运动后,中国转而以俄为师,列宁主义及其诞生地俄罗斯是影响乃至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主要思想来源。俄罗斯的传统与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决定了我国人教版教科书对俄罗斯农民媒介形象的偏好。

总体来看,农民形象在人教版第 10 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出现的频次和强度,说明主流社会在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上有共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所建构的农民媒介形象与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实际国情和我们党坚持工农联盟的政治路线是相符合的。

\* “帝俄”,系专门用语,用以区别 1917 年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政权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也不同于现在的俄联邦。



思想倾向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上”,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sup>[9]1208</sup>。教科书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是现实与出版者的认知框架相互呼应的必然结果,即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政治观与文化观两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在政治观方面,既肯定了农民的社会贡献,又直面其历史局限性。教科书着力构建的农民形象在政治上是积极的。表现在:其一,农民始终是华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创造的主力军。在人教版第10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广大农民辛勤耕耘,胼手胝足,任劳任怨,是中华文明诞生与繁荣的基本社会力量。其二,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揭竿而起,在推翻旧王朝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革命的生力军与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基础力量,农民的情况事关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是农民媒介形象以正面、积极形象为主的客观基础。

同时,教科书又表现了农民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农民视野较狭窄。2000多年间,中国农民依靠土地生存,靠天吃饭,生活范围不大,流动性弱,这决定了农民认知的局限性。再如,在近现代中国,广大贫苦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但始终无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没有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成工农联盟后,农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生产力的羁绊,成为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是教科书中农民媒介形象消极面的重要根源。

英国学者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指出,“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

地表述这个世界”<sup>[10]</sup>。在构成主义者看来,事物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来自表征系统的使用主体对各种概念和符号的运用。显然,人教版第10套中小学教科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体现了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出版者对中国农民肯定性的基本价值判断。

其次,教科书在文化观方面,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教科书中的农民媒介形象,是出版者对农耕文明的一种记忆与讲述,媒介形象背后的意义贯穿着传统文化的认识框架,其所指结构复杂。表现在:其一,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教版第10套中小学教科书中80%以上农民媒介形象来自农业生产活动。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劳作中,广大农民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忍顽强,是诚、勤、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其二,作为一个阶级出现时,教科书又建构了农民受苦受难的被压迫者形象和敢于反抗的一面。不过,在教科书中,蒙受阶级压迫的农民形象较少,仅有11.6%的农民形象涉及广大贫苦农民的社会不平等遭遇,且大多出现在语文教科书的文学作品内。相比之下,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倾向于建构阶级矛盾背景下的农民形象。乡村是农民生产生活之地,农民在这里的整体状态是美好、恬淡、悠闲、质朴。这既反映出中国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和人们对先进生产力、美好新农村建设的呼唤,又折射了主流社会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包含着对“仁”“天人合一”等儒家文化观念的欣赏与自信。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工具与培育学生世界观基本框架的重要渠道,教科书是主流社会强力推进社会共识并进而教育中小学生的得力媒介。教科书的农民媒介形象所折射出来的文化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和以西方先进思想为补充的一种文化观。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有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严

格管控教科书的政治方向和出版质量。要求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必须坚持四大制度:编审制度、选用制度、出版发行供求制度、评价制度。1986年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国定制”教科书选用制度;1986—2017年,实行的是“编审分离、一纲多本、竞编选用”的“审定制”教科书选用制度<sup>[11]</sup>;自2017年秋季开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再次进入“统编通用”时代。其中的出版环节,除短期出现若干家国有出版社具备教科书出版资格的出版垄断外,多数时期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的。不过,无论是数家垄断,还是独家垄断,教科书出版的最终决定权始终掌握在我们党手中,不合乎我们党价值理念的内容是无法在出版环节通过的。

教科书出版制度的些微变化及其一以贯之的特性,充分反映国家权力对于教科书出版活动的严格把控。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会主任韩震认为,教科书作为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遵循,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认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落地,使之落地的工具是教科书<sup>[12]</sup>。毫无疑问,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只能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框架内建构。

## 2. 形式上采用柔性教育的方式

教科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呈现,在形式上是柔性的。这集中反映在符号运用和表达方式两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在符号运用上颇具特色。其一,教科书重视文字与图片的搭配。教科书以文字为主,辅以丰富的插图。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在传播特定的价值观时通常会放弃说教的方式<sup>[9]206</sup>。中小學生处于生理、心理的发育期,社会阅历不足,思想活跃但又视野有限,与其理解能力密切相关的逻辑思维等处于持续发展状态,而语言

文字是人为的符号系统,便于概括抽象,但需要学习才可以掌握,图片则往往直指符号所指,人们借助日常生活经验往往可以理解其语义,却不便于概括抽象。显然,教科书课文的图文并茂形式有助于农民媒介形象的直接与间接建构,符合目标受众的接受偏好。其二,在语言使用上,教科书以白话文为主,以文言文为辅。语文教科书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教科书这样处理有其原因:一方面,即便晚清时期的文言文接近白话,也因与当前广大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距离远而妨碍了目标受众的接受顺畅性;另一方面,使用白话文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教科书必须遵照执行。因此,人教版第10套中小学教科书课文的文言文偏少。同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科书的又一重大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sup>[13]</sup>。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存储在一些经典著作中,因此,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语文教科书适当提升文言文在课文中的比例,有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其次,在表达方式上,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叙述所占比重最大,议论占比较小,呈现出柔性教育的特性。柔性教育是一种适应性教育,因势利导,以接受者能够或乐于接受的途径和方式,传播以世界观为依托的理念、知识信息及其体系。人教版第10套中小学教科书采用的柔性教育,具体表现在:其一,叙述总体占比最高。叙述虽主要用于记叙文,但说明文、议论文在列举材料或论据时也要使用叙述的表达方式。叙述,着重于交代事实的变化或发展过程,与形象思维关联密切,中小學生便于理解接受,有助于达成出版方的根本出版目的。叙述在政治课教

教科书中占比最多,说明出版者尊重受教育者的接受偏好。其二,议论占比较少。这是因为,一方面,议论是议论文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在记叙文、说明文中点明主题时会少量采用;另一方面,议论与逻辑思维联系密切,便于概括、抽象,故多集中运用于高中阶段的教科书内。教科书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与中小学生的接受偏好及其成长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教科书采用适应性教育的具体体现。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采取柔性教育方式的原因在于教科书所承载的功能。从表面上看,教科书与教师、学生构成课堂教学的三大基本要素,采取柔性教育方式是教科书的内容与目标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使然,但深层原因则在于教科书的根本功能,即立德树人,辅助基础教育对青少年儿童实施核心价值观、基础文化知识和公民基本素养的培育。人教社社长黄强认为,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教材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工具,教材建设要循序渐进,贴近不同年龄段学生思想、学习、生活实际,将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培养有机结合,增强教材的实效性和感染力<sup>[14]</sup>。而培养理论强调,借由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巨大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sup>[9]205</sup>。中小学教科书建构人物媒介形象不应强制灌输,而应遵循教育原理、传播规律。一方面,应根据中小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应因科目而有同有异。各科目之间有相同之处,如教科书的根本性质、基本功能一致,教育方式的柔性原则不可或缺等,但各科教科书的教学目标又不尽相同,教学方式的柔性又应各有侧重。例如,教科书要给学生以正确的人生指导,内容须具备一定的刚性,其中政治教科书讲求传播基本原理,其理论性、时效性较为突出,内容的刚

性与抽象相结合,故强化内容的柔性表现有益于目标读者接受,体现了出版者对中小学生学习特点的清醒认识,有助于受众接受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农民媒介形象。

#### 参考文献:

- [1]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5919.
- [2] 阮智富,郭忠新. 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95.
- [3] 胡乔木.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44.
- [4] 王道俊,王汉澜. 教育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68.
- [5] BERENSON B.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M]. New York:Free Press,1952:147-168.
- [6] 王力. 古代汉语:第1册[M]. 3版. 北京:中华书局,1999:1.
- [7] 武占坤. 现代汉语[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3.
- [8] 邓伟志. 社会学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1.
- [9]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0] 霍尔.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徐亮,陆兴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5.
- [11] 李水平. 新中国教科书制度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 [12] 汪瑞林. 如何发挥好三科教材育人功能[N]. 中国教育报,2018-03-12(04).
- [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 [14] 黄强. 新时代 新教材[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5-07(05).